

清官廉吏于成龙——

黄州佳话 (八)

□ 闫卫星

肃清残敌

十一月八日凌晨的战斗取胜之后，于成龙等人率军乘胜追击，中午时分赶到了吕王城。

李茂升下令士兵们埋锅造饭，稍事休息。于成龙见状后，急忙对李茂升说：“白水、石陂等地的叛军，都奉何士荣为盟主。现在何士荣被擒，诸贼胆落，无所适从。我们卷甲急趋，紧紧追杀，他们就会彻底溃散，这就是所谓的破竹之势，机不可失。如果稍一松懈，叛军进入山寨，据险坚守，就会死战到底的。”李茂升点头同意。当时锅里的饭刚煮上，于成龙就下令把米倒掉，大军立即出发。

于成龙一边行军，一边起草“檄文”，让乡勇们传示各处。他在“檄文”中说，叛乱人员如果能够反戈一击，擒拿贼首，必有重赏；临阵投诚，绝不杀害；扔下兵器，逃回家中，绝不追究；如果身上没有乡勇印号，家藏兵器者，按叛贼对待，一律处死。又把官军乡勇一战生擒何士荣、焚毁叛贼名册的事情广为宣传。

参加叛乱的“蕲黄四十八寨”人员，听说盟主被擒，名册被烧，又是恐惧又

是侥幸，纷纷解散回家。叛军的数万人马，又一次被轻易瓦解了。

十一月九日，官军乡勇进攻白水畷。一场战斗下来，周铁爪、鲍世荣、李公茂等人身边只剩下几百名亲兵，失去了战斗力。他们想退守什子寨，没想到于成龙事先已经布置罗田知县王光鼎、生员萧二至等率领乡勇五百余人，堵住了路口，另外还有蕲水知县蒋灿派生员何翩然率领乡勇200名前来助战。李公茂等人进不了山寨，只好杀出一条血路，仓惶逃走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孙将军、万野予、假周铁爪等人在麻城县石壁起兵，李公茂等人率残兵与孙将军联合一处，叛军的势力一时间扩大起来。于成龙的大军驻在白水畷，因山路阻隔，无法赶到石壁。麻城知县屈振奇向分巡道徐惺请示，调来党、伊两位参将，率正规军赶到石壁平叛。

十一月十三日，官军和乡勇攻入石壁，大战一场，擒获孙将军、万野予，李公茂等人乘乱逃走，这股叛军基本上也被瓦解。

官军乡勇继续搜捕，过了几天，李

茂升、鲁武等人先后擒获了李公茂、假周铁爪、鲍世荣、陈顿彻、鲍自性、王子之等叛乱首领。李公茂被俘后撞石自杀，伤重而死，其余首领被押送到了武昌，献给巡抚张朝珍，不久全被斩首。于成龙当时并不知道俘获的周铁爪是假的，到武昌后才被张朝珍审了出来，真周铁爪不久也被擒获斩首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搜捕小股残匪的行动仍在进行，但东山叛乱大局已定，于成龙下令班师回黄州。他当时驻扎在麻城县黄市村，在村口郑重立了一块记功石碑，上边刻着：

龟山以平，龙潭以清。
既耕既织，东方永宁。

战争评价

后世史家评价这场平叛战争说：自出军至是仅二十四日，以乡民数千破党数万，不费公家粒粟，不烦师旅，徒手奋身，摧锋陷坚而奏肤功，近世所稀也！

严格地说，这场战争动用了少量的正规军，不能说是“不烦师旅”，只是大军未动而已。另外，这场战争也不全是于成龙一个人的功劳，湖北按察使、分巡道徐惺以及王宗臣、佟世俊等一大批文武官员和地方绅衿都有战功。但毋庸置疑，于成龙是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策划者、指挥者，也是最关键的人物。

在大家束手无策时，于成龙首先提出不能放弃黄州，并且定下了以攻为守，先打何士荣，然后各个击破的战略；5000余人的精壮乡勇，是于成龙凭个人威望动员起来的；潜金寨大战，官军本已败退，是于成龙拼死杀入敌阵，成功地扭转了败局；焚毁叛贼名册，瓦解大量敌军，是于成龙的计谋；一鼓作气，乘胜追击，不给敌人喘息撤退的时间，是于成龙的远见；各处的堵截防守，主要出自于成龙事先的布置。综合这几条，我们可以确定，于成龙在此战中立

了首功。

于成龙并非职业军人，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组织这么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？他的制胜之道是什么？

第一，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，都必须具备充足的外部条件，这个条件很简单，那就是天灾人祸，官逼民反。如果有严重的水旱灾荒，百姓家家断粮，贪官污吏们不但不赈济百姓，反而增加苛捐杂税，逼得老百姓实在没有活路了，这才会坚决地走上武装反抗之路。东山的叛乱显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，大部分百姓都有地可种，有饭可吃，有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天伦之乐。只是因为当地民风强悍尚武，民间隐藏了很多英雄豪杰，这批人不甘心接受清朝统治，一有机会就想起兵造反，百姓们是在他们的鼓动或者欺骗胁迫下才加入造反队伍的，立场并不坚定。而且，“蕲黄四十八寨”的秘密组织，派系众多，各行其是，居住地分散，既容易联合起事，又容易土崩瓦解，缺乏真正的凝聚力。几位叛军首领虽然都是英雄豪杰，有一定的文韬武略和号召力，但水平仍然不算是很高的。

第二，于成龙是一位大清官，在黄

州为官多年，威望非常高。他多年来致力，就是让历经明末战乱的广大老百姓能够过上耕田读书的太平生活，这是很有吸引力的。他的办事风格又十分特别，霹雳手段与慈悲心肠并存，如果要打，就打得非常狠，如果要抚，就抚得周密细致。他成功地团结了一大批地方官吏、乡绅、豪强、生员，通过建立保甲，训练乡勇，把黄州强悍尚武的民风化为己用，让想造反的黄州百姓去打想造反的黄州百姓。在“武装征剿”的过程中，他时时不忘“宽大招抚”，给参加叛乱的百姓留下一条可靠的“后路”，孤立极少数的叛乱首领。战争双方都注意争取民心，但相比较之下，于成龙争取到的民心更多一些。

所谓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清廷平定吴三桂等人的“三藩之乱”总共用了八年时间，天下百姓受了八年的战争之苦。如果吴三桂一方能够更加顺利一些，不断取胜，最终建立一个新王朝，重新恢复民生，八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。还将会有更多的地区卷入战火，天下百姓的“水深火热”生活，就会更为严重和持久。汉族官员于成龙这时候选择努力平叛，恢复太平，对历史、对苍生，都是有贡献的。他在记功石碑上刻下的“既耕既织，东方永宁”的简单话语，其实包含了他复杂的思想感情和远大的人生理想。

黄州百姓对境内众多的“山寨”无疑是有感情的，那是他们反抗暴政的堡垒，也是保全性命的避难所。对各位“山寨领袖”也是有感情的，那些人毕竟是这块土地上的英雄豪杰啊。而对于于成龙来说，同样很有感情，那是他们的“父母官”，是关爱百姓、保护百姓的好官。于成龙在黄市村村口立的那块石碑，至今仍然保存着。当地老百姓谈起于成龙，仍然赞不绝口。



方山廉政文化园于成龙像

战后招抚

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，于成龙就已经萌生退意，向巡抚张朝珍上书请求退休。主要原因是自己年龄太大，疾病缠身，工作又过于繁重。继母李氏风烛残年，也需要儿子回家行孝。当时的某些同僚，见于成龙功名日盛，就以“不孝”为借口，在背后攻击他，使于成龙的思想负担更加沉重。他写下一首《自叹》诗，其中有几句：

小官缺养母，浮誉恼群贤。
久欲归林卧，岂为升斗牵？

战争结束后，于成龙又多次向张朝珍和湖广总督蔡毓荣请求退休，都没有得到同意。在特殊时期，上级太需要像于成龙这样的能吏了。于成龙只能硬着头皮，顶着压力，继续在官场上干下去。

于成龙的招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战争结束后，他迅速解散了各部乡勇，给他们发放了赏银，同时又严厉禁止这些乡勇敲诈、抢劫、霸占叛乱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。在于成龙的感召下，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叛乱人员陆陆续续下山投诚，回归田园。

康熙十四年正月，叛军首领黄翠林带领100多人下山乞降，得到了于成龙的宽恕和妥善安置。

河南省罗山县的叛军，听说湖广黄州的招抚政策执行得好，就越境而来，向于成龙投诚。于成龙既感动又为难，他首先妥善安置了投诚人员，然后向张朝珍请示解决办法，与河南巡抚做了一些沟通工作，最后把这批人平安送回了河南。

不久，安徽六安一带的叛军，也有不少人来黄州投奔于成龙。于成龙不仅如法安置了他们，还越组代庖地写了一封《招安谕》，让这批人拿回安徽，招抚解散其他叛乱人员。所谓“一纸胜千军”，于成龙的越境招抚工作也取得了成效，瓦解了邻省的叛乱。

于成龙作为湖广黄州知府，能够解决河南和安徽境内的叛乱，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。但是，黄州与河南、安徽等省相邻，黄州境内的传统反抗势力号称“蕲黄四十八寨”，如果加上河南、安徽境内类似的山寨，又有“七十二寨”之说。他们叛乱或者起义，往往都是联合起来的，越境造反本来就是平常事，此时越境受抚，也就不算奇怪了。另外，于成龙是讲“天理良心”的，名声在外，诚实无欺，不会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官运而滥杀无辜，这也是外省叛军敢于越境受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

在北京的魏象枢，一直很仰慕于成龙，但考虑到朝臣不宜与外吏私下联系，一直没有和于成龙公开结交。黄州之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，魏象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破例写了一首诗，托人送给黄州的于成龙：

那能亲面识于公，十载怀君梦已通。
骨带清霜撑陋俗，化行春雨起颓风。
朝绅推服千秋上，兆姓山依一念中。
闻道黄州群寇息，谁将直笔勒奇功。



大道之行
天下为公